

■ 高教治理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5.04.006

# 数字时代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 挑战与应对



刘爱生<sup>1</sup>, 魏立才<sup>2</sup>

(1. 浙江师范大学 高质量教育发展研究院, 金华 321004; 2. 中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 武汉 430036)

**摘 要:**进入数字时代,作为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的学术自由,其生存空间与发展走向受到数字革命的深刻影响。考察数字时代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可以发现:(1)大学教师的研究与出版自由受到严重削弱,表现为数字资料获取的受阻和研究问题与发表的受限;(2)大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受到严重干扰,表现为教学安全感的下降和教学自主性的降低;(3)大学教师的公共言论自由遭受严重干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政策规制和内部监控。作为一种关键变量,数字技术不仅强化了传统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对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干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让社会公众获得干预学术自由的实在力量,从而促使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陷入深层危机。面对岌岌可危的学术自由,美国一些学者、学术协会以及少数知名高校,试图通过呼吁、倡导、承诺等方式,重申对学术自由的捍卫。然而,当前各种迹象表明,美国大学已逐渐形成一种防御性的自我审查文化,学术自由的前景并不乐观。

**关键词:**数字时代;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取消文化

[中图分类号]GG64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5)04005911

在美国学术界,学术自由、终身教职和共同治理被视为一种需要遵循和维护的核心价值观。在学术自由的庇护下,大学教师可以不受法律、机构规章或公众压力等不合理干扰或限制,享有按照自身认为合适的专业方式开展教学、自由探究和出版成果的权利,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就社会重要议题发表言论的权利。学术界之所以竭力捍卫教师的学术自由权,不在于它能够给教师(包括学生)带来舒适或便利,而在于其对社会的益处。也就是说,当教育推动知识进步时,社会的长远利益才能得到更好的服务,而当探究不受国家、教会或其他机构,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限制时,知识才能得到更好的进步<sup>[1]</sup>。然而,以上论述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总体上是脆弱的、有条件

修回日期:2025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高水平开放格局下高校海外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优化研究”(BIA230213)

作者简介:刘爱生,男,江西余干人,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大学治理研究;

魏立才,男,湖北鄂州人,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研究。

引用格式:刘爱生,魏立才. 数字时代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挑战与应对[J]. 重庆高教研究, 2025, 13(4): 5969.

**Citation format:** LIU Aisheng, WEI Licai. Academic freedom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5, 13(4): 5969.

的,从未得到充分的实现<sup>[2]</sup>。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处处可见有关学术自由的争论、诉讼与判例即是最好的证明,以至于有美国学者声称:“(美国)高等教育史就是一部学术自由思想史。”<sup>[3]</sup>进入数字时代,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面临哪些新的挑战?美国大学又如何应对?

## 一、数字时代美国大学研究与出版自由的挑战

### (一)数字资料获取受阻

学术自由不仅依赖于研究者获取信息的能力,还依赖于他们能够在没有监视或阻碍的情况下探索思想和知识的自由。然而,随着学者们日益依赖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收集数据和发布研究成果,学术自由不断受到威胁。但数字工具:(1)更容易没收或破坏研究资料;(2)操纵信息;(3)控制和阻止获取信息<sup>[4]</sup>。

在美国,大学教师获取数字资料的障碍首先来自政府部门和大学内部。传统上,学者们通过学院或大学图书馆来获取已发表甚至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数字技术虽然促使许多图书馆能够借助各种在线数据库提供比过去更广泛的信息资源,但同时数字技术也方便了政府机构及高校管理者对学者的监控和对网络入口端的控制,继而引发关于隐私权和学术自由的担忧。例如,2001 年美国颁布的《爱国者法案》(*The USA Patriot Act*),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全,但它的出台对学术自由构成挑战。根据该法案的一些条款,大学图书馆被要求向政府提供借阅记录等信息,这无疑侵犯了读者的隐私权。由于监视的存在,一些学者担心他们的研究资料或获取的信息会被政府机构收集,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或麻烦,他们可能在研究过程中规避某些敏感主题。再者,大学图书馆被要求建立某种过滤机制,以确保敏感话题的研究和讨论(如恐怖主义)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利用 AI 监控学术内容,如自动标记或删除“敏感”研究主题(如某些政治或社会议题),而且这种自动化审查往往比传统手段更隐蔽、高效。很显然,这种过滤机制会限制研究人员访问资料的自由,对学术自由构成较大的威胁<sup>[5]</sup>。“虽然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管理图书馆藏书来控制学者获取印刷材料……但当大学维护并因此控制着通往互联网的入口时,限制或拒绝访问的可能性要大得多。”<sup>[6]</sup>

此外,美国大学教师获取数字资料的阻碍还包括第三方供应商。众所周知,当前大部分学术期刊由出版集团垄断。作为个体的学者如果想要阅读或下载这些出版商旗下的电子资源,就需要花费不菲的价格订阅。而且,由于出版集团在事实上形成了寡头垄断,因而它们可以大肆涨价,以至于一段时间内连财大气粗的哈佛大学都声称难以承担价格节节高升的期刊订阅费用<sup>[7]</sup>。为清除研究道路上的障碍,一些机构或个人试图利用技术手段绕开出版商的垄断,但无一例外都遭到出版商的坚决反击。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的自杀事件。2010 年底至 2011 年初,斯沃茨通过自己编写的脚本程序“非法侵入”期刊数据库西文过刊全文库(JSTOR),大量下载了原本对外界收费的论文。而后,他遭到逮捕,并被 JSTOR 指控,罪名是商业刑事犯罪。罪名一旦成立,他将受到最高 35 年监禁和 100 万美元罚款。在认罪辩诉阶段,不知是迫于压力还是其他原因,斯沃茨选择上吊自杀,年仅 26 岁,令人无比心痛和惋惜<sup>[8]</sup>。这一事件充分说明,虽然数字技术表面上方便了美国大学教师获取研究资料,但商业力量建筑的付费墙却形成了科研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极大地损害了学者的研究自由。

### (二)研究问题与发表受限

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一个新词——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指个人或企业因不当言行而遭到社会群体和媒体的集体抵制,从而“被取消”。在美国,取消文化与美国社会弥漫的“政治正确”和

“觉醒文化”<sup>①</sup>密切相关。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取消文化已从最初的一种文化现象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取消文化虽然在追求平等、多元、正义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也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极化,使美国社会深陷“文化战争”<sup>[9]</sup>。作为一场社会文化运动,取消文化不仅在美国政治界、文化界、娱乐界全面打响,而且日益渗透至学术界。美国不少大学教师因发表了所谓“不受欢迎的”“冒犯性的”学术观点而遭到各种形式的“取消”,如停课、取消讲座、降级、撤职、撤稿、开除等。根据“校园取消文化数据库”(Campus Cancel Culture Database)统计,2013—2023年,美国大学总共发生1 823次取消文化事件。其中,仅2023学年美国大学就发生130起取消文化事件,平均每周2.5起。从取消文化事件内容看,不少教授因其研究观点涉及性别认同、同性恋、种族、跨性别主义、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等敏感问题而被“取消”。为此,“学院修正”(The College Fix)在其官网忧心忡忡地指出:“取消文化持续增长且没有停止的迹象。它代表了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信仰、学术讨论、开放探究、艺术、不受欢迎或有争议的想法等的不宽容攻击。”<sup>[10]</sup>

这里以“撤稿”为例,具体阐释取消文化对美国大学教师研究和出版自由的影响。一般来说,撤稿多是因为研究者被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或研究者的实验数据出现偏差、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等。然而,在取消文化下,美国学界越来越多地发生仅仅因学术观点“冒犯”公众而被撤稿的事件。对此,美国学者甚至用“撤稿文化”<sup>[11]</sup>来形容。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的撤稿事件相当具有代表性。事件的起因是:2017年,吉利在《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发表了一篇概述殖民主义某些正面效应的论文而遭到猛烈批评。反对吉利文章的人称其为“严重错误”和“严重不公”,并声称该文“散发着对土著人民的殖民蔑视”。随后,数以千计的人要求杂志社撤回这篇文章,尽管该文在发表之前已通过匿名同行评审程序。在期刊编辑收到死亡威胁且15名编委会成员辞职之后,《第三世界季刊》撤回了吉利的文章。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吉利又经历了一次书籍出版撤回事件。当时,列克星敦图书公司(Lexington Books)在他计划出版日期前两周取消他的专著《最后的帝国主义》(*The Last Imperialist*)的出版。这次撤稿是在列克星敦图书公司收到超过1 000人签名的请愿书之后发生的。在获知自己的专著被取消出版后,吉利表示,出版商取消出版他这本“精心编写的、基于证据的传记研究”,是“屈服于一群拥有网络力量但显然不具备评判学术成果资质的人”<sup>[12]</sup>。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教师在开展研究时尽量远离敏感的选题。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2013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美国不少学者开始自我审查,避免在容易引起争端的议题上开展研究,如警察暴行、中东和北非地区问题、大规模监禁、种族不平等、同性恋、跨性别权利、堕胎等。具体来说,16%的被调查者已经避免在特定议题上开展研究;28%的被调查者避免参加社交媒体活动<sup>[13]</sup>。美国智库政党立场和意识形态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artisanship and Ideology)2021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超过1/3的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学者和博士生因其学术观点而遭到纪律处罚的威胁。为避免受到处罚,超过一半的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者承认在科研中进行自我审查<sup>[14]</sup>。

## 二、数字时代美国大学教学自由的挑战

### (一)大学教师教学安全感的下降

传统教室的概念通常指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进入数字时代,教室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

① “觉醒”(woke)一词源自美国黑人文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俚语,泛指对系统性种族歧视保持清醒和警惕,因此又译为“警醒”。如今,“觉醒”一词涵盖的政治和社会意涵逐渐扩大,从种族不平等延伸到性别、跨性别者、环保主义者、堕胎、性骚扰等社会议题。

可以指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也可以指一个虚拟的数字空间。尤其是过去几年,美国很多大学的课程都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这意味着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任何一名大学教师的教学都有可能突破传统课堂的限制,触及社会公众。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使得大学教师的教学变得更加透明,为外部力量(尤其是学校行政人员)的监督和控制在提供了便利条件。

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教学模式变革,外加当前美国社会盛行的取消文化,对美国大学教师的教学自由产生了不可预料的影响。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未经教师授权的情况下,学生将教师的授课内容(很多是脱离语境的摘录,且是富有争议的内容)发布到网络上。例如,在密歇根大学就有这么一件案例:该校一名学生匿名录制了某教授 90 分钟讲座的一部分内容,并将其剪辑成两分钟版本发布在保守派网站上,部分人称其为“反共和党言论”。在舆论压力下,学校不得不暂停该教授的教学工作。无独有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某教授布置的作业因涉及敏感的党派议题,被学生发布到推特(Twitter)上。随后,学校收到大量投诉<sup>[15]</sup>。

为确保大学教师的课堂言论符合社会正统观念,美国不少大学建立了匿名举报系统,用以报告和处置教师的不当言行。例如,耶鲁大学建立了一系列监控和匿名报告机制,包括开发用于匿名报告的手机应用程序,以及增设用于报告不当言行的匿名热线<sup>[16]</sup>。此外,校外的一些机构也开始染指大学教师的课堂言论。例如,美国的一些保守派建立了“教授监视名单”(Professor Watchlist)网站,以方便学生揭发并记录那些“歧视保守派学生,在课堂上推销反美价值观,宣扬左派立场”的教授<sup>[17]</sup>。来自校内外对课堂教学的数字监控,破坏了教授与大学生之间的信任,使得很多教授“提心吊胆地搞教学”。对此,劳拉·卡尔森(Laura Carlson)指出:“持续的警惕、监控和数字化永久记忆导致这样一种教学环境——大学教师可能更倾向通过保守主义来寻求安全,而不是用更具争议性的陈述或问题去挑战学生(或社会)。由于数字化背景下大学教师的言论都会被记录下来,课堂上一句无心之言或者被断章取义的话语一旦成为当今社交媒体复杂体系的一部分,就可能成为学者职业生涯的丧钟。”<sup>[18]</sup>

其实,早在 1915 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就关注到课堂教学的界限问题。AAUP 在《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原则宣言》中明确指出:“课堂讨论不应被视为面向公众的言论,因为后者常常是为激起反对意见或引发辩论而设计的。”<sup>[19]</sup> 1985 年,AAUP 再次提到教学自由的问题:“教室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教授在这里担任知识的引导者,所有人都被鼓励去寻求并表达他们所理解的真理。如果教室里有来自外部组织的监督员,将会对师生的学术自由产生抑制作用。”<sup>[20]</sup> AAUP 的意图很明显,即强调教室作为一个自由探索知识空间的重要性,以及外部干预为何会破坏这种自由氛围。然而,AAUP 的创始者们估计没有想到,未来的数字技术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并对师生的教学自由产生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

## (二)大学教师教学自主性的降低

根据 AAUP 的声明,教学自由包括教师选择教材、确定教学方法、布置作业以及评估学生学术表现的权利。这些教学活动由教师个人负责,其决定不受系主任、院长或其他行政官员的否决<sup>[21]</sup>。传统美国大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基本能够得到保障,因为这一时期的教学活动具有以下 3 个特点。(1)教学过程主要由单一教授掌控。教授是学科专家,拥有独立的教学自主权,教学方式和结果主要取决于教授个人的教学技能。(2)教学过程和结果难以被客观评估和分析。由于缺乏可量化的数据记录,教学质量的评估主要依赖主观判断,很难进行跨教授或跨课程比较。(3)教授被视为“工匠”式的独立从业者。教授掌握整个教学过程,独立完成从备课到授课的全部工作,不需要与其他专业人员合作<sup>[22]</sup>。然而,这种“工匠”模式正面临数字变革与挑战。

在教学内容方面,数字时代美国大学出现新的专业人员,如媒体专家、教学设计师、数据分析师和

留校率专家 (retention experts) 等。这些专业人员会参与教学过程 (往往会迎合市场需求或学生心理), 协同大学教师设计课程内容、改进教学质量。这意味着大学教师不再是独立的“工匠”, 而需要与其他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共同生成课程内容。针对这种变化, 有研究指出, 大学教学作为一种“服务交付” (service delivery)<sup>①</sup>, 日益变得工业化和标准化, 包括使用统一的演示幻灯片、教材和标准答案, 以及在平行课程中向大量学生复制这些教学方案<sup>[23]</sup>。在教学方法方面, 数字时代的大学课堂变得更加透明, 教学过程和互动都可以被记录, 以方便数据分析与比较。专业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 就像气象学家构建天气预报大模型一样, 可以绘制整个大学教师的“教学大模型”。再结合学生数据, 学校可以针对那些与模型不匹配的教师提出教学方法改进意见。虽然数字技术使得教学效果可以通过数据分析进行更加客观的评估, 不再仅依赖主观的“标准好教学”, 但是这种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评估方式, 不仅会强化高校行政人员干预教学的力量, 而且可能会限制教授在教学方法上的自由。事实上, 当前大学教师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越来越受制于学校行政管理人员, 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课程由线下转为线上, 大学管理层正是借由这一契机, 强化对教师教学的微管理 (micro-management)——试图通过创造一个更加统一和规范的教学环境, 以及推动教学方法的统一和规范化, 以达到改进教学质量的目标<sup>[24]</sup>。此种做法明显削弱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在学生评价方面, 美国大学普遍引入学生信息系统 (student information system)。这些系统不仅可以记录每个学生的在校行为表现, 如考试成绩、在校开销、图书馆借书、参加讲座次数等, 而且可以采集全校范围内的一些核心度量指标, 如平均分数、平均绩点、不及格率等。此外, 这些信息系统还可以基于大数据做出决策, 实时对学生的学业情况做出预警, 并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过程提出改进建议。虽然这些工具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支持、提高学生的成绩和丰富学生的在校经历, 但它也强化了学校对教师学术工作的监控, 影响教师的专业判断。这可能会侵犯教师的学术自主权, 尤其是关于决定学生进步的学术自由 (通过制定评分标准和确定成绩), 以及自由选择如何评价学生进步的方式 (通过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sup>[25]</sup>。

### 三、数字时代美国大学言论自由的挑战

#### (一) 大学教师公共言论的政策规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教师在教学和研究中使用诸如脸书 (Facebook)、推特 (Twitter) 等社交媒体, 因不当言论引发的舆论风波呈高发趋势。一旦发生舆情, 不仅教师本人会成为焦点, 其所在的大学也会卷入其中, 对学校办学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在此大背景下, 美国大部分大学制定了“社交媒体政策或指南” (social media policy/guidelines)。这些政策主要规定大学教师以个人或学校员工身份使用社交媒体的一般原则, 但其出台却引发了侵犯学术自由或言论自由的担忧。在许多学者看来, 这些政策的目的与其说是规范教师的言论, 不如说是维护大学的品牌价值<sup>[26]</sup>。

众所周知, 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 大学品牌变得愈发重要。作为大学的无形资产, 它关涉大学吸引师资、生源、科研基金和捐赠的竞争力。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关键变量引入高等教育领域进一步推动了大学向企业化方向发展。这种企业化倾向既可视作大学对技术进步的一种及时响应, 同时也是大学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而做出的战略调整。事实上, 数字革命与大学的企业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sup>[27]</sup>。因此, 维护大学品牌自然成为管理者需要重点考虑的事项。由于教师的不当言论直接影响大学的声誉, 管理者投入更多的精力监控教师的言论就是必然选择。可见, 随着

① 服务交付指通过一系列流程和步骤, 确保服务按照预定的标准、质量和时间要求提供给客户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服务的设计、开发、实施、监控、维护和支持等环节。

美国大学继续重组其治理模式以趋向于商业导向,声誉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大学教师公共言论引发的争议可能会阻止主要捐赠者,并吸引无关的媒体和政治关注<sup>[28]</sup>。然而,保护学术自由与维护大学品牌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很难实现二者的平衡<sup>[29]</sup>。实践中,堪萨斯大学制定社交媒体政策的过程可以充分说明数字时代美国大学教师言论自由的受限。事件起因是该校大卫·古思(David Guth)教授针对 2013 年 9 月美国出现的一场严重枪击事件在推特上发表的一段猛烈批判美国步枪协会(NRA)的言论:“鲜血沾满了 NRA 的手。希望下一次中枪的是你们自己的儿女。为你们感到羞耻。愿上帝诅咒你们。”他的这番激烈言论立即像病毒一样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在许多枪支拥护者看来,这是莫大的冒犯和羞辱。为此,一些人对古思展开了人身攻击和死亡威胁;一些政府官员给学校施压,要求将此开除。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堪萨斯大学在“可能违背正当程序和学术自由”的情况下,很快将古思无限期停职。鉴于古思舆论事件给学校造成的不良影响,堪萨斯大学于 2013 年 12 月制定了社交媒体政策。政策规定,如果教职工不恰当地使用社交媒体,将有可能遭到停职、解雇或开除。对于如何定义不恰当地使用社交媒体,学校的规定相当宽泛,认为教职工的网络言论只要“违背大学最大利益”“干扰学校正常运行”等,都可以判定为不恰当地使用社交媒体。堪萨斯大学社交媒体政策出台后,引起广泛争议。堪萨斯州政府官员和学校董事会站在坚持的一方,认为该政策的出台能够促进大学教师负责任地使用社交媒体,且赋予了学校管理层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用以处置那些玷污大学声誉的教职工。但是,AAUP 认为,该政策公然违反了学术自由原则,强烈要求学校董事会废除此项政策。面对 AAUP 的批评,堪萨斯大学董事会一开始同意修改这项政策,但当任务小组制定出一个全新政策时,董事会予以否决,并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原政策<sup>[30]</sup>。可见,在大学声誉与学术/言论自由之间,美国大学管理者会优先选择前者。

## (二)大学教师公共言论的内部监控

美国大学教师的言论自由除了受学校政策的影响外,也越来越受到学校内部的监控,主要表现为美国大学兴起的揭发文化——这与美国大学校园流行的“安全主义”紧密相关。格雷格·卢金诺夫(Greg Lukianoff)等人在《娇惯的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指出:“互联网世代”(1995 年以及之后出生)的大学生,其社会关系模式、观念形态乃至行为方式,深受反社会的社交媒体的影响。相比“千禧一代”(1982—1994 年出生的一代),“互联网世代”的新一代成长要缓慢很多,心智更为脆弱,而焦虑、抑郁症甚至自杀的比例却高得多。这些变化推动了安全主义在美国校园内的兴起。这种安全不仅包括人身安全,如远离交通事故和性骚扰,还包括“情绪安全”——美国大学生认同他们需要被“保护”,凡是他们不同意或感到不适的观点,都应该屏蔽起来。在他们看来,观点不够“正确”的讲座及教授,应该被“取消”<sup>[31]</sup>。为保护学生的“情绪安全”,美国不少大学成立了监控教师公共言论的机构。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 2017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过去几年,美国许多大学成立了“偏见反应小组”(Bias Response Teams),以方便师生匿名向学校行政人员和执法机构举报具有冒犯性的言论。这些小组监控并调查师生的言论,引导执法机构注意师生的言论表达。该报告还指出:(1)“偏见反应小组”倾向泛化“偏见”的概念,以至于任何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言论都可以打上“偏见”的名号;(2)揭发校园“偏见”与维护言论自由之间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张力;(3)“偏见反应小组”的存在,表明校园自由和公开的言论正在遭受威胁,会对校园言论产生寒蝉效应<sup>[32]</sup>。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大学越来越难以高举言论自由的旗帜。相反,任何胆敢质疑性别、种族、文化、遗传、殖民主义、性身份、性取向等教条的教授(包括学生),都有可能遭到学校的严厉惩罚。例如,2016 年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就对其教师明确表示:如果你在种族、性取向、性别、宗教等问题上发表冒犯性言论,你可能会被停职甚至被解雇,拥有终身教职的教师也不例外。对此,尤金·沃洛克(Eugene Vo-

lokh)评价道:“长期以来,美国大学一直认为公众必须容忍教授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与既定的道德和政治正统观念大相径庭,即使这些观点会冒犯他人、引起骚动(间接导致混乱)……俄勒冈大学似乎正在放弃这一立场,尤其是针对特定话题的某些言论。”<sup>[33]</sup>

为避免因不当言论而给自身带来的风险和惩罚,美国大学许多教授选择谨言慎行和自我审查,以至于美国大学逐渐形成一种防御性的自我审查文化。2020年,“异见组织”(Heterodox Academy)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大学大部分教师会经常性地自我审查,害怕因发表错误观点而被解雇。这种情况甚至已经发展为很多人害怕点赞或转发推特,以免招致某种纪律处分。以往那些声称言论自由、科学数据和健康辩论的支持者,今天也不再敢公开宣布这种支持<sup>[34]</sup>。

#### 四、美国学术界如何守护学术自由

数字时代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当前美国大学学术自由面临的危机是自20世纪初以来最严峻的<sup>[35]</sup>。信息(数字)技术给学术自由带来一系列挑战,既考验着现有的法律保护,也强化保护的需求<sup>[18]</sup>。那么,在数字时代,美国学术界是如何应对岌岌可危的学术自由的?

##### (一)学者呼吁:教育第一,政治第二

在学术自由遭到严重威胁的背景下,虽然许多美国大学教授选择明哲保身,在学术研究和公共言论中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审查,但还是有一些充满正义和良知的教授呼吁:美国高校要涵养学术自由生长的沃土,捍卫教师学术自由的权利——学术自由是一种社会赋予大学教师的专业自由,这种自由的授予并非旨在改善教师群体的生活境遇,而是为了提升教学科研质量,尤其是服务公共利益。因此,学术自由的权利必须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和保护。其中,史蒂芬·明茨(Steven Mintz)教授的呼吁很有代表性。他在《教育第一,政治第二》(*Education first, politics second*)一文中指出,大学当为探究真理与创新发现的枢纽,若其未能恪守教育使命或屈从外部压力,其作为学习与探究中立空间的公信力将岌岌可危。应对这些挑战,高校应重申坚守学术自由的承诺,确保师生能够无惧审查、骚扰或恐吓,自由地开展探究与辩论。大学须制定明确的政策,在保护学术自由的同时遏制仇恨言论与歧视行为。面对外部压力,大学应将教育使命置于任何政治议程之上。通过聚焦批判性探究、包容性知识追求,大学方能守护学术操守,持续作为求索与成长的沃土,这要求大学即使遭遇阻力或非议,仍须矢志坚守其核心价值<sup>[36]</sup>。再如,约翰·威尔森(John Wilson)在《变化的媒体与学术自由》(*Changing media and academic freedom*)一文中指出,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定社交媒体政策的本质是为钳制教授发表争议性言论。正因社交媒体极大便利了学者面向公众发声,校董会遂对此实施专项打压。尽管其声称该政策未侵犯学术自由,实则通过制造教师群体的寒蝉效应,已经构成对学术自由的实质性戕害<sup>[37]</sup>。又如,2021年哈佛大学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教授出版了一本面向公众的新书《理性》(*Rationality*),试图通过此书向社会传授“理性”,从根源上瓦解取消文化的生存土壤,最终重塑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sup>[38]</sup>。2023年,在史蒂芬·平克倡导下,哈佛大学200名教师成立了“学术自由委员会”(The Council on Academic Freedom),致力于推动学术自由,促进理性对话。

##### (二)学术协会力挺:数字时代,学术自由享有同等保护

在美国,各种学术协会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就包括对学术权力的争取和对学术自由的捍卫。许多学术协会和机构,如AAUP、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AAC&U)、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等,都制定或发布了保护学术自由的政策或声明。对数字时代的学术自由,美国不少学术协会均予以跟进。例如,2004年AAUP颁布的《学术自由与电子通信》(2013年重新修订,*Academic freedom &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开篇就指出,数字沟通中的学术自由、自由探究和公共表达自由

不应受到比传统印刷媒体更严格的限制,除了媒体本身的特殊性质要求外(如技术特性导致的必要限制)。所以,学术自由适用于所有媒介形式,包括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在线课程平台等。无论是传统课堂还是虚拟教学空间,教师的研究、教学和表达权利都应受到同等保护。为更好地维护数字时代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AAUP 提出 3 点建议:(1)遵守共同治理准则。信息技术政策不应仅由技术部门决定,而需通过教职员委员会共同制定。例如,社交媒体使用规范、网络访问限制等政策需反映学术自由需求,避免行政单方面决策。(2)明确学术自由的边界与责任。教师在数字沟通中需区分个人言论与机构立场,但学校不应过度要求免责声明。同时,教师需警惕数字沟通的不可控传播性,避免敏感言论被断章取义。(3)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学校在处理涉及数字通信方面的投诉时,需遵循正当程序,避免未经调查即限制访问权限。学术自由保护包括有争议的言论,除非其直接威胁安全或严重违背职业道德<sup>[39]</sup>。再如,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指出,在数字化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课程被搬到线上,围绕学术自由与知识产权归属的争议和侵权问题不断。因为线上教学系统可能强制教师使用标准化测试工具,这种情形无疑会剥夺教师个性化考核的权利,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自由;学校管理层和平台运营商可以随时访问教师上传的全部课程内容、学生作业及讨论记录,这种行为不仅侵犯教师的隐私,还是一种对教师的数据监控和对学术自由的侵害。为此,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提出 3 点应对之策:(1)高校需摒弃“技术至上”思维,将学术自由置于平台便利性之上;(2)教师应提升数字权利意识,审慎阅读平台条款,积极利用开放资源与知识共享协议;(3)立法者需完善法律框架,限制《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对学术通信的过度索取<sup>[40]</sup>。

### (三)大学官方声明:重申对学术自由的保障

美国大多数高校都承诺支持学术自由、探索自由和言论自由。但问题是,这些承诺大多起草于 20 世纪初,现如今已经无法充分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进入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教授和学生因言获罪,为此,2015 年 1 月芝加哥大学在全美范围内率先颁布《芝加哥声明》(Chicago Statement)。《芝加哥声明》首先回顾了芝加哥大学自建校以来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作出的独特承诺: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思想碰撞的战场。接着,《芝加哥声明》重申承诺为所有成员提供最广泛的表达自由,允许其“发言、写作、倾听、挑战与学习”,不因观点“冒犯、愚蠢、不道德或错误”而遭受压制,反对以“文明”或“尊重”为名关闭讨论或禁言。当然,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并非无边界,以下情况可受限制:违法(如暴力威胁、诽谤、骚扰);实质性侵犯隐私或机密;干扰大学正常运作。最后,《芝加哥声明》号召大学所有成员行动起来,维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原则——不仅要推进活泼且无畏惧的辩论和评论自由,也要在他人企图限制这种自由时,站出来保护它<sup>[41]</sup>。在取消文化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芝加哥声明》为美国高校提供了坚守学术自由的范本。截至 2024 年 12 月,美国总共有 112 所大学采纳或认可了《芝加哥声明》,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知名高校。实践中,在捍卫学术自由的行动中,美国一些高校就援引了《芝加哥声明》。例如,2023 年密歇根大学修订校园言论政策,明确引用《芝加哥原则》,禁止以“情感伤害”为由取消争议演讲<sup>[42]</sup>。

## 五、结 语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关键变量,正深刻重塑美国大学的学术生态。其表面上为中立的工具,实则通过数据控制、资源垄断等方式,系统性削弱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成为政治权力与资本力量渗透学术领域的“隐形推手”。此外,数字技术的普及也正重构美国公众与学术机构之间的权利关系。传统上,学术自由被视为大学与学者独立于外部干预的权利,但数字技术通过信息透明化、舆论动员和数

据民主化,促使普通公众能够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甚至影响学术活动。而且,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政治权力、资本力量和公众力量之间形成一种共振效应,共同作用于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简言之,数字技术不仅强化了传统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对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干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让社会公众获得了干预学术自由的权利。当然,面对数字时代学术自由遭遇的各种挑战,美国学术界并非无动于衷。其中,一些知名学者、学术协会以及部分美国著名大学,通过呼吁、倡导、承诺等方式,试图捍卫学术自由。然而,在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愈演愈烈的当下,重申对学术自由的承诺往往知易行难。例如,《芝加哥声明》的推广运动虽然被 100 多所美国大学认可,但对比 4 000 多所美国大学的总数量,其成效极其有限。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场运动本质上是芝加哥大学的营销策略,无助于改善美国大学学术自由日渐式微的格局<sup>[43]</sup>。再如,2024 年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利兹·马吉尔(Liz Magill)等顶尖大学因校园“反犹”言论而被迫辞职,揭示了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存在的深层危机:在政治极化、资本渗透和身份政治的裹挟下,学术自由正从“真理探索的基石”沦为“可交易的商品”<sup>[44]</sup>。总而言之,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更像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制度性幻象,其虚假性植根于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深层运作逻辑。

## 参考文献:

- [1] Advancing academic freedom[EB/OL]. (2024-04-12)[2024-08-15]. <https://www.aaup.org/our-work/protecting-academic-freedom>.
- [2] 美国高校的身份政治与“生而脆弱”的学术自由[EB/OL]. (2023-05-16)[2025-05-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6034727780198465&wfr=spider&for=pc>.
- [3] FRANK B, MELANIE W.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digital age[J]. On the horizon, 2014,22(2):136146.
- [4] TANCZER L, MCCONVILLE R, MAYNARD P.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for academics[J].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16,1(4):346355.
- [5] DEREK D. Paradoxes of generative AI: both promise and threat to academic freedom[J]. AAUP journal of academic freedom, 2024,15:115.
- [6] O'NEIL R.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wired world: political extremism,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universi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181.
- [7] 刘爱生. 知识民主与高校科研变革[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41(1):3543.
- [8] Aaron Swartz's legacy[EB/OL]. (2014-02-01)[2024-07-29]. <https://www.aaup.org/article/aaron-swartz%E2%8099s-legacy>.
- [9] 赵梅. 美国文化撕裂现状及其影响:美国“取消文化”评述[J]. 人民论坛, 2023(3):9396.
- [10] Year in review:130 campus cancel culture incidents during 202324 school year[EB/OL]. (2024-06-25)[2024-08-19]. <https://www.thecollegefix.com/year-in-review-130-campus-cancel-culture-incidents-during-202324-school-year/>.
- [11] JAIME A T. How to shape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digital age? are the retractions of opinionated papers a prelude to “cancel culture” in academia? [J]. Current research in behavioral sciences, 2021(2):100035.
- [12] Bruce Gilley vs Cancel Culture[EB/OL]. (2020-10-30)[2025-04-30]. <https://quillette.com/2020/10/30/bruce-gilley-vs-cancel-culture/>.
- [13] NSA Surveillance & US Writers[EB/OL]. (2013-11-11)[2025-04-30]. <https://pierrejouris.com/blog/nsa-surveillance-us-writers/>.
- [14] ERIC K. Academic freedom in crisis: punishment,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and self censorship[R]. San Gabriel, C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artisanship and Ideology, 2021:116.
- [15] BAGUS P, DAUMANN F, FOLLERT F. Microaggressions, cancel culture, safe spaces, and academic freedom: a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rgumentation[J]. Business ethics, the environment & responsibility, 2024,33:523534.
- [16] CABRANES J A.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due process, and for Yale: the emerging threat to academic freedom at a great university[J]. Yale law & policy review, 2017, 35(2):345365.

- [17] Being watched[EB/OL]. (20161121)[20240815].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6/11/22/new-website-seeks-register-professors-accused-liberal-bias-and-anti-american-values>.
- [18] LAURA C.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EB/OL]. (20240325)[20250512]. <https://ssrn.com/abstract=381229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812293>.
- [19] 1915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Academic Tenure[R]. Washington DC: AAUP, 1915:3.
- [20] Report of a special committe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Florida's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 Washington DC: AAUP, 2023:132.
- [21] GWENDOLYN B. Freedom to teach statement[EB/OL]. (20140215)[20240903]. <https://www.aaup.org/article/freedom-teach-statement>.
- [22] FRANK M. The professor as craftsman in the digital age[J]. Internet learning, 2012,1(1): 16.
- [23] BRUCE M. Reframing the freedom to teach[G]//WATERMEYER R, RAAPER R, OLSEN M. Handbook on academic freedo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22:147159.
- [24] BRUCE M. Why choice of teaching method is essential to academic freedom: a dialogue with Finn[J].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24,29(2):536548.
- [25] SIMON B. Marking boundaries and algorithms shift in grade inflation row[EB/OL]. (20210203)[20240713].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marking-boundaries-and-algorithms-shift-grade-inflation-row>.
- [26] MCNEILL T. "Don't affect the share price": social media policy in higher education as reputation management[J]. Research in learning technology, 2012,20:152162.
- [27] MCCLUSKY F B, WINTER M, UZWYSHYN R. The idea of the digital university: ancient traditions,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higher education[M]. Washington DC: Westphalia Press, 2012:19.
- [28] KWESTEL M, MILANO E F. Protecting academic freedom or managing reputation? an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social media polici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 2020(10):151183.
- [29] LAUREN S. Balancing academic freedom and professionalism: a commentary on university social media policies[J]. FIU law review, 2013,9(1):7476.
- [30] Protected tweet? [EB/OL]. (20130922)[20240809].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3/09/23/ukansas-professors-suspended-after-anti-racism-tweet>.
- [31] 格雷格·卢金诺夫, 乔森纳·海特. 娇惯的心灵: “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M]. 田雷, 苏心,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8.
- [32] Report on bias reporting systems[EB/OL]. (20170827)[20240825]. <https://www.thefire.org/research-learn/bias-response-team-report-2017>.
- [33] EUGENE V.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bad purposes[J]. UCLA law review, 2016(1):13661421.
- [34] Academics are really,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ir freedom [EB/OL]. (2020-09-01)[2024-08-13].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9/academics-are-really-really-worried-about-their-freedom/615724/>.
- [35] Is academic freedom in crisis[EB/OL]. (20231129)[20250322]. <https://www.aamc.org/news/academic-freedom-crisis>.
- [36] Education first, politics second [EB/OL]. (2024-08-28)[2025-04-25].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opinion/blogs/higher-ed-gamma/2024/08/28/academic-freedom-autonomy-scholarship-and-activism>.
- [37] JOHN K W. The changing media and academic freedom[J]. Academe, 2016,102(1):812.
- [38] STEVEN P. Rationality: what it is, why it seems scarce, why it matters[M]. Viking: Penguin, 2021:12.
- [39] HENRY R. Academic freedom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J]. Journal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academy, 2014(4):4257.
- [40] Academic freedom and facul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era of Zoom and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EB/OL]. [2025-04-26]. <https://www.mla.org/About-Us/Governance/Committees/Committee-Listings/Professional-Issues/Committee-on-Academic-Freedom-and-Professional-Rights-and-Responsibilities/Academic-Freedom-and-Faculty-Intellectual-Property-in-the-Era-of-Zoom-and-Learning-Management-Systems>.
- [41]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Chicago principle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R]. Chicago, 2015:12.
- [42] JEANNIE G. The future of academic freedom[N]. The New Yorker, 2024:127.

[43] OSITA N. When “free speech” is a marketing ploy[N]. Slate,20180323.  
[44] 哈佛校长辞职:“反犹”背后的政治风向之争[EB/OL]. (20230223)[20250325]. [https://www.lifeweek.com.cn/mobile/audioText/?\\_artId=220118#/](https://www.lifeweek.com.cn/mobile/audioText/?_artId=220118#/).

(责任编辑:张海生 杨慷慨 校对:杨慷慨)

Academic Freedom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LIU Aisheng<sup>1</sup>, WEI Licai<sup>2</sup>

(1. *Institute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36,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as a core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freedom has experienced profound impacts from the digital revolution regarding its existential space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Examining academic freedom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du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t can be found that: first, university faculty’s freedom i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undermined, evidenced by restricted access to digital resources and limitations on research topics and publications; second, teaching freedom has been subjected to severe interference through a decline in teaching security and a reduction in teaching autonomy; third, faculty members’ freedom of public expression has faced severe constraints through increasing policy regulations and internal surveillance. As a pivotal variable, digital technology not only reinforces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interventions in academic freedom but also empowers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substantive authority to influence academic discourse, thereby plunging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to a profound crisis of academic liberty. Confronted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ecarious situation, some American scholars, academic associations, and a few prestigious institutions have attempted to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academic freedom through declarations, advocacy, and policy commitments. However, current indicators suggest that American academia has developed a defensive self-censorship culture, rendering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academic freedom decidedly pessimistic.

**Key words:** digital age; American universities; academic freedom; cancel culture